

何東身份認同的心結

• 黃紹倫、鄭宏泰

一 引言

何東為何值得我們注意？從身份認同的角度上說，我們選擇以何東作案例，並不單單因為他富有，而是他的一生基本上反映了早期香港約一百年的發展軌迹，他走過的道路更與香港、中國及英國之間的交往息息相關，因而被認為是「香港故事」的代表性人物，是窮小子白手興家的經典。何東到底是何許人？社會上為甚麼對他有這麼多爭論？他的身份認同問題又為甚麼會如此複雜？

攻伐不斷的軍閥「停戰休兵，召開和平會議」時，一位署名「和森」的人在一份名為《嚮導週報》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何東是何許人〉的文章，批評何東背景不明。文章這樣寫道^①：

何東是甚麼東西？是一個香港的富商。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看他的姓名是中國人，而他的頭銜就是英國的爵士。一說他入了英國籍，一說英國賜他這種頭銜，俾他以中國富商和英國貴族的兩重資格在中國政治上來出風頭。何東所號召的會議是甚麼東西？據路透社第一次所宣傳的是「在西人監督下的全國領袖會議」。

何東的一生基本上反映了早期香港約一百年的發展軌迹，他走過的道路更與香港、中國及英國之間的交往息息相關。社會上為何對他有這麼多爭論？他的身份認同問題為何會如此複雜？

二 備受多方質疑的人物

對於「何東是何許人？」的問題，早在上世紀的20年代已有人提出。1923年，當何東北上呼籲各為私利而

事實上，還有很多質疑何東身份的批評，出現的時間較早，批評亦較尖刻。這些批評不但來自華人社會，還來自歐人社會，質疑何東到底是不

* 本文的資料來自“Entrepreneurial Families: The Rong, Gu and Ho Tung Business Dynasties”的研究項目，該經費來自大學研究資助局(HKU 7468/05H)，謹此致謝。本文乃香港歷史博物館「周末公開講座」(2008年6月21日)發言稿的修正本，並對袁詠琪小姐給予的支援表示感謝。

何東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一直表現得十分清晰，不但行為舉止、衣着服飾等均十分華化，他在人前人後更表示自己乃是中國人，對國家效忠，甚至大做慈善、造福桑梓。圖為穿唐裝的何東。



是中國人？效忠對象究竟又是誰？舉例說，在已解禁的殖民地部檔案中，我們找到一份港督盧押 (Frederick Lugard) 在1908年寫給殖民地部的通信，講述一宗與何東有關的房產爭議，指他：「傳聞是由一位何仕文先生和一個中國女人所生的私生子。」^②這顯示在殖民地官員的眼中，何東起碼有兩重身份，一為混血兒，另一則為私生子。

然而，何東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一直表現得十分清晰，不但行為舉止、衣着服飾等均十分華化，他在人前人後更表示自己乃是中國人，對國家效忠，甚至大做慈善、造福桑梓。就以1923年他四出奔走呼籲大小軍閥結束內戰一事為例，在其中的一個場合上，何東曾直接表示自己乃是中國人。他說^③：

我的位置就如伍廷芳博士一樣，我亦是香港出生、長大，雖然香港屬於英

國人統治，但我從來沒有失去對自己祖國的熱愛，我仍是一個中國人，亦不會以身為中國人而感覺恥辱。

由於他的身份引起了太多爭議，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何東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值得留意，就是無論從外表上或在許多社會場合上，他都深思熟慮、苦心經營自己的身份。何東的么女何孝姿在其個人回憶錄中，對何東衣着打扮一絲不苟的描述，可讓我們看到何東對自己的身份多麼在意。何孝姿這樣說^④：

父親高大、英俊。他年輕時，愛穿西裝，後來卻改穿唐裝：一襲或深或淺的藍色長衫，配上黑色絲綢的寬袖馬褂，所有衣鈕扣得很穩當。他常穿絲綢做的長褲，褲腳繫到足踝上，並穿上黑色的唐裝鞋，但有時亦會配上西式的鞋子。他戴的是中式卜帽，頂上有一小紅球。父親看起來總是一絲

不苟的，臉上每根鬍鬚都剃刮得整整齊齊。

何孝姿還表示，何東早期其實曾經穿着過西裝，但後來便大大轉變了，不論是在內在外，會見不同賓客均一直只穿着唐裝，甚少轉變了。

三 急速轉變的社會背景

導致何東的身份認同問題變得如此複雜的原因，除了其混血兒背景這個基本因素外，還有當時華洋混雜的社會環境，以及香港作為聯繫東西的網絡地位和社會結構。我們認為，香港社會的興起，可以看作是一個網絡社會的興起；閱讀其發展過程，自然可以讓我們看到各種各樣關係的建立和發展。中國社會有別於其他社會的有趣地方，是中國傳統社會一直表現出高度的集中和穩固，更是一個以士人為核心的文化中心。

滿清王朝的急速衰落，衍生了中國文化中心崩潰的危機，而中國文化中心崩潰的危機，更可看作是香港網絡社會形成的背景。網絡社會的特點，是「主權分享」——即是說社會的政治核心不以士人為中心，政治精英也不可獨攬權力，因而出現了「權力多元化」的現象。這樣的環境，令身份認同和效忠問題變得更為複雜多變，再加上香港是華洋共處的地方，英國殖民官員只是小眾，人數非常少，「權力多元化」的問題，便顯得理所當然了。

要了解身份認同的混雜性質，我們明顯要跟這種環境結合起來討論。由於當時的華人社會出現了一種「文

化覆滅」的憂慮，甚至覺得恥辱。當時的部分知識份子擔心整個中國會被列強瓜分，中國文化可能走上覆沒之路，而當時有人甚至提出，華人在中國的情況，很可能會像印第安人在美國一樣，整個文化被完全消滅怠盡。正因如此，當時的華人社會內已存在一種莫名的恐懼感，覺得有可能亡國，甚至整個中華文化會從此消失。

與此同時，英國統治者也有一種內心的焦慮、一種無聲的恐懼。這種統治者的警覺，可以反映在如下三個問題上：

- 一、作為一個少數的統治者，一定要鞏固本身的權威，不可令權威受到挑戰；
- 二、一定要培植並獲得支持者，並在大多數華人裏找到一些同盟者，同時獲得一些支持者；
- 三、要防止離散。建立起同盟後，一定要防止他們反叛或出現效忠對象的轉移。

在這個背景下，特別是在二十世紀初社會及政局急速轉變的時候，當時的香港自然亦處於一種相對敏感的時候了。舉例說，在1894年，美國出現了排華運動，令一批在舊金山謀生的人士回流香港，這些以「四邑幫」為代表的回流人士，曾在香港推動一場杯葛美貨的運動。事實上，在1890到1900年初期，香港社會的情況頗為動蕩，曾經發生了反美、反殖運動，引起當時殖民地官員的憂慮，令他們必須慎重考慮以往所依賴的華人，到底哪些是可靠、哪些又是不可靠的呢？在他們看來，如果「四邑幫」不可靠，

1890到1900年初期，香港社會動蕩，引起當時殖民地官員的憂慮，令他們必須慎重考慮以往所依賴的華人，到底是否可靠。在這種環境下，像何東這樣的混血兒自然有了冒起的機遇。

到底要扶植哪些華人與之抗衡呢？在華人社會中，找其他領袖來鞏固統治地位又是否最可靠呢？

我們認為，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像何東這樣的混血兒自然有了冒起的機遇。換言之，在那樣的社會背景下，作為混血兒的何東由於一出生就不是個清清楚楚的華人，他實在應該有着不同的選擇機會，但他最終還是「以身為華人而自豪」，並將其基業穩穩地扎根在香港這塊土地上。以下不妨讓我們深入一點探討可供何東選擇的三個可能。

四 抉擇一：不當「半唐番」

何東很清楚，亦已很早便做了決定，自己不當「半唐番」——即是不選擇做混血兒。當然，我們必須指出，他的先天條件是沒辦法改變的，但從他女兒的傳記或評論中，我們可以發現，何東很少評論自己的出生，亦很少談論自己的父母，目的顯然是要淡化天生的混血兒背景。

作為英國殖民地的華人社會，華洋通婚實際上存在很多障礙，一方面來自歐人社會，另一方面則來自華人社會。英國政府規定，無論在政府裏或是在大機構裏，均不接納殖民地高級官員和華人通婚，這種規定，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消除。這種限制跨種族通婚的規定，製造了種族鴻溝，而那些違背這種規定而誕生的混血子女，自然亦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令這些混血兒必須採取方法淡化這個身份。

在華人社會，一些大家族亦不鼓勵子女與外國人通婚。利希慎家族便

是其中的一個有趣例子。在利德蕙撰寫的有關其父親利銘澤的傳記中，便清楚地指出，其父親及叔伯到英國讀書時，當時祖父利希慎便警告他們，不可娶外國女子，若果娶了外國女子，將不獲繼承家產的權利^⑥。

也即是說，不論是英國人社會，還是本地的華人社會，大家都因各自的民族優越感而各樹樊籬，拒絕民族間的通婚，因而令混血兒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難以打入主流社會。正因如此，當時的社會才出現了一種混血族群相互通婚的現象——即混血兒大都娶混血兒，情況正反映了他們沒法打破種族鴻溝。

我們知道，何東先後娶了兩個老婆——兩個都稱為「平妻」，並納有一個妾侍。兩個平妻分別是麥秀英和張靜蓉，兩人都是商人之後，她們的父親都是混血兒；妾侍名叫周綺文，由於資料所限，我們並不知道她的背景，亦不太肯定她是否亦是混血兒。何東的子女中，何世榮是過繼的，乃胞弟何福之子，何世勤、何世儉和何世禮都是親生子，其中何世勤早夭；除此之外，何東還育有八個女兒，他們大約一半以上與混血兒通婚，族內婚的比例非常高。到了第三代，情況似有改變，但是與混血兒通婚的情況仍然顯著。有關這個十分有趣的問題，我們在此不展開論述，希望日後有機會另立研究項目再作討論。

何東不想當「半唐番」，但在自己和子女的人生大事上，顯然沒有太多選擇。從這個種族通婚的問題上，我們想到了他的先人。在港島摩星嶺道與薄扶林道交界處，有一個專為混血兒而設的墳場——昭遠墳場，該墳場是何東在1897年向當時的港督羅便臣

不論是英國人社會，還是本地的華人社會，都因各自的民族優越感而拒絕民族間的通婚，因而令混血兒難以打入主流社會。何東不想當「半唐番」，但在自己和子女的人生大事上，顯然沒有太多選擇。

(William Robinson) 爭取的，作為混血兒去世後的墓地。

昭遠墳場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墳場，這個墳場的建立，應與當時香港政府成立華人永遠墳場和其他墳場有關，因為當時的墳場主要以種族為分野，這是一個很值得留意的現象。在昭遠墳場內，我們可以找到何東的祖墳。作為混血兒，何東顯然面着對很多純種華人所沒有的巨大挑戰，究竟怎樣才能建立起像純種華人般的血緣與宗族身份和地位呢？因為他的父親是外國人，母親是華人，在祖墳、墓碑上又該如何表達出來呢？

正如我們在《香港大老：何東》一書中指出，不知是故意與否，在墓碑上，何東稱呼自己的父親為「仕文何府君」，並不是中國傳統的寫法「何仕文府君」。這種寫法是否正在暗示他不是傳統中國人呢？另一方面，我們亦注意到，他對母親的稱呼是「施氏太夫人」，亦不是大多數香港華人在墓碑上的寫法，傳統稱呼應該是「何門施氏太夫人」。從以上這些微妙的稱呼中，我們多少可以感受到混血兒在身份認同上的獨特、尷尬及無奈之處。

由於混血兒面對許多困難——英人社會不接納他們，華人社會亦排斥他們，何東生前曾大力支持成立一個由混血兒組成的「同仁會」(Welfare League)，專為陷於孤立無援的混血兒提供支援、協助，該會成立於1929年，很有華人社會宗親會的影子。從該會出版的一些刊物中，我們注意到，一位名叫安德遜(Anderson)的混血兒曾在成立典禮上提出兩個要點，令人玩味。他說：「歐亞混血兒有困難時只得向自己的族群求助：外人就算不落井下石，亦不會寄予同

情」^⑥。也即是說，作為混血兒，他們只能依靠混血兒的支援，因為其他人不會同情他們，亦不會施以援手。接着，他還痛心疾首地說^⑦：

吾等歐亞族裔，生於斯，長於斯；吾等不求特權，但亦會誓言捍衛吾等之權益。吾等亦當告訴世人，由於秉承古老的中歐血脈，其素質既不使吾等優於他人，亦不應視作吾等不能作為良好公民之理據。

當然，在今天的社會，有些人或者會指出，歐亞混血兒應是一種很好的結合，很多模特兒、明星、運動員都來自這個類別。但是，在香港開埠初期，像何東這樣的人卻遭到歧視，他們因而只可以自己的力量維護自己的權利，從而表示自己並不低人一等，亦不高人一等。

雖然如此，我們卻注意到，當時的混血兒在香港社會中其實擁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尤其是在當買辦的崗位上。由於混血兒擁有中英雙語的能力，特別是英語能力，同時亦了解中國文化，可說是充當買辦的不二之選。何東家族可說是個買辦家族，除何東、何福及何甘棠三兄弟乃渣甸洋行買辦外，其眾多子姪亦曾擔任買辦工作。舉例說，何世榮和何世儉是匯豐銀行的買辦；何世光 and 何世奇在沙宣洋行任買辦；何世卓、何世華則在有利銀行任買辦；其他如姻親羅長肇、羅長業、黃金福、謝家寶和蔡立志等，均曾任不同洋行的買辦，他們奔走於華洋之間，構成一個網絡廣披的買辦家族^⑧。

除了混血兒的雙語能力令他們在買辦工作上擁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外，

混血兒擁有中英雙語的能力，亦了解中國文化，是充當買辦的不二之選。加上混血兒沒有「鄉下」，後退無門，洋行大班對他們有較大的信心，令何東等混血兒變成了最佳的買辦人選。

何東家族內部一直流傳着這樣的一個說法：「寧為華人頭，毋為鬼佬尾」。何東選擇不做「鬼佬」的原因，並非全屬情感上的，與他所遭遇到的歧視亦有一定關係。

他們「後無退路，沒有鄉下可返」的先天性缺陷，亦變成了他們的「優勢」。我們或者未必了解，買辦制度的出現，其實是外資洋行在華經商時為了降低經營成本及投資風險的一種特殊設計。正因如此，能獲委任為買辦的人，一般均要得到洋行大班的信任，有良好的信譽，並必須繳交為數不少的「擔保金」，以防他們為逃避責任或為謀取個人私利而挾帶私逃。

匯豐銀行數位地位顯赫一時的買辦，便曾因經營環境、匯率及其他方面的波動，甚至是投資失誤而須承擔巨大風險，最後弄至債務纏身，甚至要逃離香港，返回佛山及廣東等地避債。由於混血兒買辦沒有「鄉下」——即沒有鄉族、宗族等網絡，因而形成了後退無門的格局。那些洋行大班或者正是看中了這一點，因而對他們有較大的信心，令何東等混血兒變成了最佳的買辦人選。事實是否如此，我們希望日後有機會深入探討，但有一點則可以作為這個問題的註腳——從何東、何福及何甘棠三兄弟在香港斥巨資籌建大屋(祖屋)的行為上看，他們「以港為家、扎根香港」的想法，似乎是十分明顯的^⑩。

五 抉擇二：毋為「鬼佬尾」

上文解釋了何東主觀上的身份選擇，他不想當「半唐番」，因為當「半唐番」太痛苦了，哪怕這種條件在客觀上支持了他的事業發展，實際上他一直希望可以擺脫「半唐番」的身份。第二個可供何東選擇的，即是當個「鬼佬」，他可以選擇做英國人。可是，他應該很清楚，如果他當英國人，就只會排

在英國人的最末尾。正因如此，何東家族內部一直便流傳着這樣的一個說法：「寧為華人頭，毋為鬼佬尾」。也即是說，如果選擇當「鬼佬」，就會排在英人之後，淪為「跟尾」。

正如前述，早年的何東曾作過「洋人」打扮，穿上西裝、西服，令人不難感受到他的「鬼佬」味道。年紀稍長之後，他則一直避免這樣做，一直只穿唐裝。事實上，在四個兄弟中，何東、何福及何甘棠三人雖然選擇了華人身份，並大多時穿上長衫馬褂，但其六弟何啟佳(Walter Bosman)，卻選擇了另一身份，寧可穿起西裝，做個「鬼佬」，從不穿上唐裝。

與何東、何福及何甘棠一樣，何啟佳亦在中央書院(後來改名皇仁書院)接受教育，貴為當時少有能接受英語教育的一批精英份子。畢業後，何東參與海關事務，然後加入渣甸洋行，走上了買辦之路；何啟佳的成績比三位兄長還要好，學業上非常出色，獲得了許多獎學金。他不但選擇了一個英國人的名字，用上生父Bosman的姓氏，還決定到英國留學。學成後，何啟佳並沒有返港，亦不留在英國，而是轉往南非，由工程師晉升至總工程師，最後甚至官至南非政府的工務局局長(Director of Public Works)。他人生的絕大部分時間，均留在南非，退休後亦如此，甚少返回英國或香港^⑪。

我們認為，何啟佳定居南非的這個特殊選擇，或者與南非政府對非純種白人的歧視沒有像英國那麼嚴重有關。無論真正原因如何，何啟佳在事業、人生及身份認同上與何東截然不同的選擇，說明混血兒的確是有不同選擇機會的。

從不同資料上看，何東選擇不做「鬼佬」的原因，並非全屬情感上的，與他所遭遇到的歧視亦有一定關係。這兒不妨讓我們列舉兩則例子加以說明。第一則與他的子女教育有關。雖然何東事業有成，亦累積了不少家財，參與了很多社會慈善公益事務，但他的子女卻一直無法進入山頂歐童學校就讀。事實上，何東已是唯一的例外了，他已可在山頂居住，甚至擁有位於山頂的大宅了。

更早之前的1901年，何東曾捐出一筆為數不少的金錢予香港政府，建立一所以英語授課的學校，讓不同種族的學童都能入讀，但該所校舍落成後，卻因遭到英商及官員反對而要改為一所只接納英童的學校（即現在的英皇佐治五世學校），不准其他種族學童入讀。決定更改學校收生對象的人，乃是當時殖民地政府的最高決策者港督卜力（Henry Blake），他所持的理由則是，擔心不同種族兒童一起學習會「產生某些因為兩個種族融合在一起的不良道德效果」^⑩。換言之，當時的英國人認為，他們的子女如果與華人或其他族裔子女在學校一起學習，會帶來道德上的墮落，使其子女無法被教養成紳士（gentleman）。

正是因為以上的理由，港督卜力要求更改何東捐款的用途，並曾經象徵式地詢問他的看法，而何東最終只得表示了無奈的接受。這裏反映了一個不爭的事實——何東雖然富有，但財富的影響或作用，其實存在着很大的極限，很多事情實在不是因為有錢便能做得到，當然亦不能使他超越種族的鴻溝。

回到1914年要求送子女到山頂學校就讀一事。該年，何東認為，在家

中接受多年書塾教育的子女，已達適學年齡，應該送他們到學校接受正規教育，因而要求讓他們入讀山頂學校，但是，該項申請遭到校方拒絕，其中有原因指出，若然有歐亞混血兒入讀，「學校將無法成功運作」，其理由之牽強，與早年更改何東捐款設立多種族學童學校為只接納英童學生的理由如出一轍^⑪。

經過一輪爭辯後，何東的申請雖然最終獲得港府的支持，但他後來還是沒有將子女送到山頂學校，而是改為入讀拔萃女書院及皇仁書院^⑫。至於女兒何艾齡在其個人回憶錄中更深刻地描述了當年她們「每天都要奔波勞碌，從山頂坐轎下山，之後坐船過海，然後再坐車往校上課」的情況，這或者正是「原區就讀」要求被拒的有力說明和記錄了^⑬。

第二則例子則與何東計劃進駐山頂有關，說明他在英人眼中的地位是多麼的低微。1908年，當時的首席按察司白吉特（Francis Piggett）與港督盧押因為出租按察司府第問題發生了衝突。事情是這樣的，白吉特在山頂有一住所，名叫The Eyrie，位置比港督的居所Mountain Lodge高少許。由於快將休假，白吉特希望將該大屋出租，賺點錢，並透過中介人的介紹而找到了何東，但這一舉動被港督獲悉後，認為不妥，要求白吉特不要如此做，但被白吉特拒絕，雙方因而將問題鬧大。

盧押認為，此事關係重大，一定要通過行政會議決定，而行政會議最終否決白吉特將大屋租予何東的舉動，其中的原因指出：1904年，港府已通過了《山頂區保留條例》（*The Peak Ordinance*）——即華人和其他非英籍人士不得在山頂居住。其次，盧押還

當時的殖民地官員對何東的身份有兩種看法：一、何東是雜種；二、在決定何東為華人後，華人如住在山頂高於港督的住所，地位便會凌駕於港督之上。因而產生殖民地者統治權威受到華人挑戰的恐懼。

就何東是否華人的問題，作出了清楚的指引，指出在行政會議上，議員的決定是：「何東應被列作具華人血統的居民」^⑮。也即是說，雖然何東是混血兒，但在這條例的眼中，他是一個中國人。

從檔案的記錄上，我們還發現，盧押拒絕讓華人住進山頂的其中一個令人無奈的說法，竟然是因為覺得白吉特的The Eyrie高於港督的Mountain Lodge，怕何東住進該大屋，會影響他的地位。行政會議決定的其中一節內容如下^⑯：

混血兒變成華人領袖有一定的好處。統治者面對身為華人領袖的混血兒，溝通比較容易；華人以「半唐番」做自己的代表亦無所謂，因為他們能打通與上層的關係。可是，混血兒沒有血緣和地緣關係。

華人社會對華人居於山頂的舉動具有十分特殊的看法和投射，亦十分重視，在他們心目中，此宅高踞總督的山頂別墅，當然很具權威。因此，本局反對將此屋租賃予他。如若任其租賃，無知華人反而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其他的反對理由還包括此租賃人乃三妻四妾的半唐番，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私生子。

從以上的決議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當時的殖民地官員對何東的身份有兩種看法：一、何東是雜種；二、在決定何東為華人後，華人如住在山頂，地位便會凌駕於港督之上。用今天的眼光看，這當然是一個荒謬的說法；但在當時華洋共存的無聲恐懼時代，這應是殖民地官員極為重視的原則。上述1904年的條例的推行目的，正是由於當時的華人社會經濟力量已大幅膨脹，殖民地統治階層已覺得受到威脅，因而要採取各種方法，維持本身高高在上的優越地位；而何東住進山頂，「位置」甚至高於港督的情況，自然觸動了政府最敏感的神

經，因而產生了殖民地者統治權威受到華人挑戰的恐懼。為了鞏固本身的統治，港府情願作出一個在平常人眼中不合理的決定，甚至令白吉特亦感不解，想到向倫敦抗議。可見就算混血兒想打入英國人的社區，亦不容易。

六 抉擇三：寧為「華人頭」

何東不願做「半唐番」，也不想跟「鬼佬尾」，他要當華人領袖。當華人領袖的一個好處，就如何東的女兒何慧姿所說，香港華人不會公開排斥他，雖然在婚姻上依然有障礙，但至少在社會場合或其他場合都不敢或不會公開排斥他。和混血兒當買辦的優點及競爭優勢一樣，混血兒變成華人領袖有一定的好處。在統治者的眼中，如果面對一位身為華人領袖的混血兒，他們的溝通比較容易；在華人眼中，以「半唐番」做自己的代表亦無所謂，因為他們能打通與上層的關係。因此在這種環境下，他們都變成了高級華人，甚至是華人代表。

話雖如此，要當華人代表仍要下少許功夫，因為他們沒有血緣關係和地緣關係。傳統華人的社會裏，一定要有籍貫，在1933年的香港華商總會名冊中，我們注意到了「何曉生」（即何東）的登記，當時他為該會的顧問，登記職業是「殷商」，而籍貫一項則寫上了「香港」，反而其他純種華人則寫上「台山」、「新會」或「南海」等等，即上文所說的「鄉下」。在那個年代，在各項登記上，提供籍貫是必須的，作為華商代表，更一定要有籍貫。明白到自己沒有籍貫的核心問

題，何東在名冊上填寫了「香港」，其家族中的混血兒成員如羅文錦、羅長肇和侄兒何世光、何世華、何世耀等，同樣填上了「香港」，顯示當時的混血兒已基本上認定香港為扎根之所，較世紀之初前認為本身「祖籍寶安」的說法^⑦，有了很大的轉變，並多少說明了香港的獨特地位已逐漸獲得了不同人士的肯定。

另一方面，我們認為，既然當上了華人代表，何東亦明白到必須先讓殖民地統治者安心，甚至是消除統治階層疑心的重要，以免令他們產生雙重效忠的疑慮。有關雙重效忠的問題，可從1926年行政會議考慮是否委任周壽臣為第一個華人行政局議員一事中看到。由於當時周壽臣對香港政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在省港大罷工期間扮演的積極角色，所以有建議委任周壽臣為第一個華人代表，加入行政局。殖民地部大臣在整個討論中的其中一封致港督的信函中，便清楚地把雙重效忠的憂慮作出了解釋，而檔案中的其中一個記錄，則多少說明了當時殖民地官員的小心考慮^⑧：

在華人之中，要找到一個既有足夠權威又夠可靠，既忠誠又值得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的華人，可謂為數極少，並不易見。

明顯地，當時殖民地官員考慮問題的核心，不單是能力問題，讓華人進入行政局，一定要考慮效忠問題、信任問題，甚至要有長遠思量，一點亦粗疏不得。文件接着還指出^⑨：

殖民地的存廢與盛衰，對那些商人階級而言當然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但得

緊記英屬華裔子民的雙重國籍身份問題，他們對中國的血脈相連與自然關係，會令他們在某些時候在壓力面前作出符合自然聯繫的決定。

也即是說，殖民地官員很清楚華人社會對中國的效忠是永遠存在的，而這個雙重國籍在危機出現時，就會令效忠問題變得尖銳，產生令人懷疑的地方。正因如此，殖民地官員一直均表現得極為審慎，考慮得極為周詳。何東為效忠問題爭取了兩次的機會，顯示他本人其實亦很清楚殖民地官員的憂慮。

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1915年，英國向德國宣戰時，何東當機立斷地向英國政府捐助三架軍機，一半的捐款以自己的名義捐出，另一半則以大有銀行的名義捐出。由於他這種表態，以及對英國軍方的大力支持，同年的年中，他立即被賜封為爵士。當然，在封爵時沒有指明是甚麼原因，但時間上是非常吻合的，而當時他貴為全港第二位受封華人爵士，可說是一種很大的榮譽，顯示出何東苦心經營，希望消除殖民地官員對他的效忠問題的疑慮，否則，他無法得到殖民地政府的信任，成為有效的華人領袖。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情況或者比較簡單，因為歐戰不牽涉中國，何東可清楚地表示他是英國屬土公民，效忠英國皇室，所以被封為爵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何東得到消息，離開香港到澳門避難，因此他沒有被牽扯到「漢奸」的問題上。戰後，夏慤(C.H.J. Harcourt)將軍專誠繞道澳門，邀請何東乘坐他的戰艦返回香港。回港後，何東在一份給英國政府的內部文

殖民地官員很清楚華人社會對中國的效忠是永遠存在的，而這個雙重國籍在危機出現時，就會令效忠問題變得尖銳，令人懷疑。因此，殖民地官員一直極為審慎地考慮華人代表人選。

件中解釋，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轉到澳門，是為了避免依附日本，他清楚地於1946年寫給英國政府的信函中說^②：

日軍曾經用盡各種方法要求合作——既有引誘亦有威脅，要求我與他們合作，但我可以十分坦誠和滿意地說，我仍是一個十分忠誠的英國屬土子民。

何東要在私人信函中重新向英國政府表示他沒有異心，令英國政府無法從他的行為上找到任何有可能產生疑心的迹象。正因如此，到了1955年，何東才能史無前例地二度獲晉封為爵士，從而說明他的效忠問題，獲得了英國政府的認同和接納，進一步鞏固何東用盡一切辦法建立起來的可靠華人領袖的形象。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何東面臨身份抉擇時的決定是很清楚的，亦很簡單：一、不願做「半唐番」；二、不想打入英國人社會，變成「鬼佬尾」；三、花上很大力氣，要成為華人領袖。很明顯，雖然何東仍是個「半唐番」，但他仍以「高級華人」的形象出現。然而，我們同時又注意到，縱使我們從紛紛陳陳的許多資料中找到何東身份認同上的一些抉擇，但對何東內心深處到底如何理解「自己到底是甚麼人」的問題，仍然覺得撲朔迷離。

從一張他送給女兒的簽名相片上，我們看到他身穿傳統華人的衣着，但卻用上英文簽名——何東大部分的相片都是這樣，我們從未見過他使用中文簽名。他送給別人的照片差不多都是用英文簽名的。還有，他的各間大屋，如山頂大宅The Falls，雖

是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但很清楚以英國貴族為堡壘命名的方式取名The Falls。另外，在西摩道八號的「紅行」(Idlewild)，亦是以這種方式取名，而且也不是一個傳統中國的建築。最後，還有他的遺囑，是一份以英文詳細列舉的遺囑。至於他臨終前選擇信奉基督教，死後葬在跑馬地香港墳場，與麥秀英葬在一起，而非葬在他一手爭取成立的昭遠墳場，亦帶出他身份認同上的弔詭之處，令人玩味。

七 結語

總結而言，何東的身份認同問題，令我們想到香港的幾個特點：

- 一、正如賽馬場上的情況一樣，不一定是純種馬才會贏，混血馬也有一定的優勢；
- 二、作為一個邊緣人，無論如何苦心經營，在選擇身份認同的具體處境中仍會出現一些錯漏或不足的地方；
- 三、身份認同危機的出現，以戰爭時期最為明顯，在那個時刻，我們無可避免地要有所選擇，擁有雙重國籍的香港人，到了打仗時，便要清楚地表明自己到底站在哪一方；
- 四、在何東家族裏，無論是兄弟也好，子女也好，都有不同的身份選擇和效忠選擇。

以上幾點令我們想到了混血兒的困境。我們經常說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但實際上跨種族通婚並不普遍，而通婚後所誕生的子女，特別是混血兒族群，更面臨着很大的種族

何東在衣着、行為、說話等都表現得很傳統、很正統，但真正的中國人其實並不著意。混血兒堅持一絲不苟，反而「露出馬腳」，令他們與主流社會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讓人覺得彼此有別。

歧視問題，這其實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另一課題。

像何東這種混血兒，為何這麼難打入主流社會呢？為此，我們想到了邊緣人自覺的問題，並想引用著名學者伯林(Isaiah Berlin)一段十分有趣的描述作結，因為何東的境況與歐洲猶太人難以打入當地社會頗為相似。伯林指出^⑩：

異鄉人要活下來，首先要清楚了解當地人的習慣和行為模式……異鄉人嘛……對當地人的生活模式感到相當陌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異鄉人要用盡精力去了解原居民的整個生活模式，從而明瞭這個生活模式的運作。

也即是說，猶太人用盡了一切的精力，去了解當地的風俗、習慣、禁忌等等，亦盡量融入當地文化風俗，但仍覺不被接納，仍感自己乃「陌生人」。伯林續寫道^⑪：

正是這一點，異鄉人總是讓人覺得他們仍然屬於「外人」——他們對原居民族群的了解太透徹了；他們下的功夫太着痕迹了；他們只不過是這個族群的專家，而難以成為他們的一員。

換言之，就是由於猶太人太着意了，像何東一樣，在衣着、行為、說話等都表現得很傳統、很正統，但真正的中國人，其實並不着意；他們的行為舉止其實很隨意，有時甚至會改變風俗，甚至不拘小節。但是，混血兒卻不然，他們堅持要一絲不苟，並花盡心思去堆砌。正因如此，他們外表的「完美無瑕」，反而「露出馬腳」，令他們與主流社會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讓人覺得彼此有別。

註釋

① 和森：〈何東是何許人〉，《嚮導週報》，第39期(1923年9月8日)，頁4。

②⑬⑭ CO (Colonial Office) 129.347.24849, *Leasing of Houses in Hill District to Chinese*, 10 July 1908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364; 374; 364-65.

③⑧⑨⑫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書店，2007)，頁195；219；104-106；186；272。

④ Florence Yeo, *My Memories* (Pittsburgh: Dorrance Pub. Co., 1994).

⑤ 利德蕙著，陳小芳譯：《築橋：利銘澤的生平與時代，香港，1905-1983》(Scarborough: Calyan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⑥⑦ Eric P. Ho, *The Welfare League: The Sixty Years: 1930-1990* (Hong Kong: Welfare League, 1990), 8; 9.

⑩ Irene Cheng, *Intercultural Reminiscences* (Hong Kong: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997).

⑪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9.

⑬ CO 129.410.17849, *Peak School*, 15 May 1914, 14.

⑭ Irene Cheng, *Clara Ho Tu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m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6), 76.

⑰ 何文翔：《香港家族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2)。

⑱⑲ CO 129.495, *Colonial Office to Clementi*, 8 November 1926, 585.

⑳㉑ Isaiah Berlin, *The Power of Idea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6; 167.

黃紹倫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鄭宏泰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